



枪林弹雨中拍《延安与八路军》

口述 抗战史



徐肖冰 浙江桐乡人(1916—2009)。三十年代初在上海“天一”、“电通”、“明星”、“西北”等影片公司工作。1937年,在山西太原参加八路军,同年冬赴延安,从事摄影工作,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技术部长、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摄影师,在陕甘宁边区、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新闻记录电影与摄影创作。著名摄影家,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。

我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到延安去的。刚在太原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,总理正好在太原,总理接见我的时候,他对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的小青年很爱护,他说,你到前线去,跟战士们一起过过部队革命大家庭的生活,听听枪炮声,对你都有好处。所以我就到前线115师,杨得志那个部队生活了一段时间,然后就从那里到延安去了。

1938年秋天,袁默之、吴印咸他们从武汉,带着电影器材到延安以后,就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电影团,第一部大型的纪



录片就叫《延安与八路军》。1939年1月把延安的东西基本上就拍完了,我们就到敌后,到晋西北、到晋察冀等华北的几个根据地都去了,主要由吴印咸跟我,我们两个人担负这个片子摄影的工作。因为我比较年轻,所以在战场上参加战斗这个任务,主要交给我来完成。从平原一直到山区,我参加了好多次战斗,百团大战是其中一个大的战役。

百团大战中间的时候,有一次敌人窜入解放区一个叫关家垱的地方,我们部队基本上把关家垱给包围了,这个地区都是山包,敌人在这边这个山上,彭德怀在那边山上。彭老总这儿离敌人就隔了一个山沟,直线距离也就是几百米。实际上部队给彭老总挖了一个战壕,给彭老在战壕里头观察敌情指挥战斗。但是彭老总根本就不用那个战壕,他就坐在



▲ 百团大战后,民兵在太行山拆除日军碉堡

徐肖冰 摄

◀ 彭德怀副总司令在“百团大战”时,于山西省武乡县关家垱前线炮台观察敌情,指挥战役

徐肖冰 摄

战壕上面,电话什么的都在战壕里头,他就一面(用望远镜)看着,一面指挥战斗,敌人的炮弹子弹,都在彭老总的周围飞过,我在那里拍这张照片,当时不觉得怎么样,但是过后有点害怕,真是枪林弹雨。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全部都消灭在那儿了,战斗是打得很艰苦很激烈的。

1940年打榆社,是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部队第一次打敌人的城市据点。这个战斗就是由陈赓部队来担任的,你看敌人成天都是那个飞机,在我们阵地上面扫射轰炸弹。

这张照片里,这个炮楼里头还有日本鬼子,我们架了一根木头,上面架了一个梯子,战士爬到那里去,往炮楼里头丢手榴弹,平常部队都藏在地洞里头,等到要冲击了,部队就从地洞里头出来,这是一个打榆社主攻的一个点。

你看边上这个战士已经负伤了,被敌人子弹打着了,从那个木头棍子下来了,这个地方躺了一个牺牲的战士,有的还往上冲的。我就从这个位置拍过去,离敌人太近了,敌人在这个地方还用机关枪、步枪在扫射。

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主攻方向,这个地方如果不去的话,别的地方拍不到什么东西,所以我务必要去。按照部队的规定,我作为一个文艺兵,还得要跟领导打个招呼,结果领导对我们非常爱护的,不准过去。不准过去我也一定要去,我知道从哪一条路怎么过去,要经过敌人的一个封锁沟,沟里头我们牺牲的战士不少。原来我还有一个通信员,我通信员都没有打招呼,就悄悄地自己拿了电影机,从牺牲战士的血泊里头匍匐着过去了,拍了不少东西,有一些因为当时太紧张了,焦点都

虚了,但是我这些片子都还在,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。

特别是我们部队打到这个炮楼里头的时候,缴获了敌人的一门炮。我看这一门炮拉出来,高兴得不得了,战士们也高兴,我还在那里拍。没有想到炮里头还有一发炮弹没有打出去,战士们有推的有拉的,结果有一个战士正好拉到炮栓,把那发炮弹给打出来了。那个炮口也比较低,我正好在这里,当时我们基本上都埋在土里头,我也震晕过去了,什么也不知道了,后来其他的战士赶快抢救重伤的,这倒把我搬醒了,我一看又没有受什么伤,我就拿起来(机器),我继续又拍这个片子了。这个战士就在这个地方拍的,是敌人从这个炮楼里头打出来,大概是机关枪打的,打在脑袋上几个子弹,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特别难受,看到热血在那里冒着,流得满脸都是。

战斗里头,像这种场面太多了,说实在话我们在武器上面处在劣势,敌人天上有飞机,地面有各种武器,我们就靠战斗的智慧、顽强拼搏的精神。

当时感觉就是,怎么样千方百计把这个战斗的任务来完成了,想的没有这么多,身上带的电影机、照相机,还有一支手枪,也有手榴弹,除了业务上面的工具,还有战斗的武器都装备了,有时候也参加战斗,也跟敌人打起来。这个仗打完了以后,陈赓就动员我不要拍电影了,就在他部队里头当个连长营长,他说“行啊,你打仗还可以”。

(根据杨克林、孙金媛1995年2月22日北京采访录音整理)

记忆中的抗战 征文

屠刀下的幸存者

沈丽珍 口述 张林凤 整理

我今年70岁,是一名日军屠刀下幸存者的女儿。我妈亲历了两次淞沪战争,每次都离死神一步之遥。

我妈叫高小妹,老家在江湾镇北三里路左右的沈家宅,有一条清水悠悠的小河从村中流过,把沈家宅分为浜南场、浜北场,我家在浜南场。

遇屠村 仅一人逃生

1932年,一·二八淞沪战争爆发,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村庄,噩梦般的灾难由此开始。日军从吴淞口登陆后,见中国人就杀。一时间人心惶惶,村上很多人家都拖儿带女逃难去了。我妈个子矮小,出生时因接生不当造成左腿残疾行走不快。妈妈硬逼着我爸带着十岁的儿子(我大哥)去逃难;自己和五岁的女儿(我大姐)留在家,岂料祸从天降。

春节前的一天,我大姐在屋外面场地上玩耍,突然看见端着枪的鬼子凶神恶煞般冲过来,大姐吓哭了,一面哭一面往家奔跑,蜷缩在灶头的角落里。鬼子追到家里,乖巧的大姐还说:“先生我不

哭,我不哭、不要打我……”鬼子竟然朝着我大姐“砰”地就是一枪,见大姐瞪着惊恐的眼睛挣扎着,鬼子“砰”地又是一枪,一个鲜蹦活跳幼小的生命霎时倒在血泊之中。

痛不欲生的妈妈还没缓过神来,又惨遭打击。那是农历正月十九下午,浜南留在村上的都是老弱病残的人,日本鬼子说是要向村民训话,把我妈和村民统统驱赶到村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客厅里。那个目光狰狞的鬼子扫视着在场的村民后,一句话也没说,只挥了下手,那些包围着村民的鬼子就用枪向人群扫射起来。还没反应过来的村民纷纷倒地,整个大客厅里顿时血流遍地。我妈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,子弹纷纷从她头顶上掠过。她围着围兜,胸前的口袋里有一盒“洋火”,有一颗子弹竟然从她前面村民的身体里穿出,打在她胸前的火柴盒上,火柴盒被打碎了,子弹才没打进妈妈的胸膛。妈妈被压在人堆里昏死过去,再次醒来时,发现四周死一般寂静,就挣扎着用力推开压在身上的人,推推这个不动,呼唤那个没应答,才发现留在村上的

五、六十个村民都死了,就剩下她一个还活着。在这次日军屠村中,妈妈的继祖母、姐姐、小叔叔也都被杀害。她强忍着疼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,跌跌撞撞整整走了一夜,才来到江湾镇,使出浑身的劲拍一家茅草房的门,这家主人开门看见门口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,触摸一下还有气,便抱进了屋里,先给喂了点热水,再熬了点热粥,把我妈救了。妈妈后来才知道,原来浜南村紧挨场中路和逸仙路,交通便利,日军要在此地建军营,就对浜南村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村。

经过千辛万苦,我爸带着大哥终于找到我妈,一家人得以团聚。可浜南村的家早被日本鬼子霸占建成了军营,家破人亡无处栖身。

遭轰炸 弹片擦头皮

1937年,八·一三淞沪战争爆发,日本侵略者又一次在江湾实施暴行。这次我爸坚持带着大哥和我妈妈一起逃难。

听说东洋人不打租界,爸爸搀扶着妈妈冒着随时被日军炮火击中的危险,拼命地往租界赶。我

妈腿有残疾,实在走不动了,爸爸背起妈妈让大哥拉着衣角,随着洪水般的难民,挤上外白渡桥涌进苏州河南岸的租界,来到设立在大世界的难民接纳站,里面早已人满为患。

人挤人地好不容易挪到三楼楼梯口。管理人员要把他们塞进里面的一间小房间,那里已经挤满人,有个孩子正哭闹着肚子饿,我妈不愿进去,管理人员就用鞭子狠狠地抽在我妈随身带着的破席子上,我妈就是赖着不去。里间哭闹的孩子被大人带出上街买吃的,管理人员就让后面跟上的家人挤入小房间。岂料,那户人家五六口人刚挤入小房间席地而坐,一颗炸弹忽地从天而降,小房间霎时被炸飞了,可怜那家人灰飞烟灭,一块弹片同时嵌入我爸的手臂上,我妈头皮也被一块弹片擦破。惊恐万分的难民转身向楼下逃,逃到街道上,眼前的惨状更令爸妈惊呆了:满街道焦土瓦砾,电线杆上、树桩上挂上残肢断臂惨不忍睹,呼天抢地的哭叫声让空气中都充满颤栗和死亡。

几番辗转,我妈逃难到现

在虹口的香烟桥路地区,找到一间被炸得没有门的破房子安顿下来。为了糊口,我爸到河里去拷浜捉点鱼卖,在桥上设关卡的日本鬼子看见就会抢去,嘴里还说着“咪西咪西地”,敢怒而不敢言的我爸,只有自认倒霉。我妈更是悲惨,有一次过桥时,日本鬼子嫌我妈走得慢,对着我妈狠狠地刺了一刀,刺刀从我妈腰间穿过,幸好没伤着肾脏,在床上躺了不少日子。

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,我爸妈也在江湾镇万安路865号居住下来。到了1946年1月我出生了。我父母一生生育了七个子女,只存活了我一人。在我幼年记忆中,四十多岁的母亲,满脸沧桑,看上去犹如六十多岁的老奴。1948年我父亲又生病去世了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我和妈妈才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给妈妈的身心烙下极大的创伤。妈妈生前多次叮嘱我,千万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,要将她在日军屠刀下九死一生的故事让孙辈们了解,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。